

## 一位“纯粹的学者”的追求

——记厦门大学杨春时教授

文/高上

作者简介：高上，男，河南驻马店人，厦门大学2012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文艺学。



杨春时教授

提起杨春时先生的名字，人们会想起一长串响亮的名号和显赫的业绩：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文学主体性论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第三次美学论争的发起者、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的发起者、后实践美学代表人物、“主体间性超越美学”体系的建立者、多部国家级规划教材十余部学术专著及二百余篇论文的作者……这位成就卓著的杨春时先生，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

### 立志做纯粹的学者

作为一位生于40年代末的长者，杨春时先生的学术道路，注定充满波折和坎坷——也正是这些挫折，让他的人生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早在中学时期，杨先生便对文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有广泛的兴趣，博览群书，思想特异。就因为这一点，他的思想鉴定每每得到“骄傲”、“偏激”的评语。他在高中时期就发表了多篇作品，其中一篇刊登于《光明日报》的文章，竟然反对成绩“全优”、主张“突出特长”，引起争议。加之他理科成绩虽然尚好，但文科成绩特优，故以“偏科”闻名学校。在今天看来，中学时代的“骄傲”和“偏科”，恰恰是他日后学术研究创造力的源头。

1966年，作为优秀高中毕业生的他得到了保送法国留学的机会。然而，史无前例的国家浩劫——“文化大革命”却在那个夏天轰然爆发，他在海外继续学习的前景顿成泡影。文革中，成为“逍遥派”的他，与一些同学进行了“地下阅读”，如饥似渴地偷读了大量被打成“封资修毒草”的古今中外的作品，充实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后来，杨先生作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艰苦的生活尚可忍受，而贫乏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无书可读却令他痛苦万分。他家中的藏书早在文革之初就几乎被焚毁殆尽，所剩无几的“马、恩、列、斯”著作成为蹉跎岁月里唯一可能的思想资源。他把这些书籍带到乡下，同时还偷偷地与其他知青互换书籍，如饥似渴的读书成为唯一的乐趣所在。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在黑暗的帐篷里，他点起油灯阅读和做笔记，并且进行艰难的思考。在文革后期，杨先生已经开始反思、质疑文革，这些阅读和思考提供了批判的武器。



1977年, 高考制度得到恢复, 已近而立之年的杨先生终于通过高考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学学习。在杨先生的简历中,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段记叙: “1977年, 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实际在1978年春入学); 1979年, 考取吉林大学文艺学研究生; ……”一年时间里完成本科学习并考取硕士生, 这样的经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足够的传奇性, 可是在跟学生们聊天时, 杨先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年纪太大了, 本科实在读不下去了……事实上, 充满紧迫感的他不甘心把时间“浪费”在按部就班的本科学习中, 而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找回来。更重要的是, 此时他已经立下了终生做学问的志向。于是他向学校提出报考研究生的要求。这意味着, 他不仅要把本科四年全部的课程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 还要把已经荒废了十余年的外语提高到硕士研究生的入学水平。经过一年的备考, 他终于被吉林大学文艺学专业录取。自此, 他开始走上自己的学术道路。

从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至今的30余年里, 杨春时先生先后在黑龙江省社科院、海南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工作, 从冰天雪地的大东北, 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 又到鹭江之滨的厦门, 他始终坚持着挚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他的学术成就日渐增长, 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对学术的坚守也成为终生的信仰。但是, 在90年代末, 他的学术生涯遇到了变数: 他被选拔为副省级后备干部, 而且据说是排名在前, 已经上报……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 在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里, 当官是最高理想、最好的归宿。面对求之不得的好事, 杨春时教授却做出了相反的努力: 他使尽了浑身解数, 三番五次给领导写信, 找领导谈话, 最后甚至托私人关系, 请领导吃饭, 而他的目的却令人跌破眼镜, 是请组织收回成命! 领导被他的执着所感动, 从不理解到理解, 从不允许到允许, 终于还他以自由之身。这件事流传开来, 人们都赞为奇闻。这反映出杨先生自己独特的逻辑和坚定的信念: “做纯粹的学者”。在杨先生看来, 学术才是最高追求, 官职和名利, 不仅是遮住望眼的浮云, 更是对学术事业的羁绊。

### 永不止步的学术“超越”

在知识分子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谢泳教授曾这样评价杨先生: “杨春时先生是我一向仰慕的学者”, 因为“他从不固步自封”。谢教授的评价堪称精当, 杨春时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从不固步自封, 永远不断超越的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30余年里, 在不断更新的理论建构中和一次又一次的学术争鸣中显示了他作为学者最突出的特质: 不断的超越, 包括对主流学术思想的超越, 也包括对自己的学术思想的超越。

上个世纪80年代, 思想解放的大潮涌动在曾经万马齐喑的神州大地,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美学领域成为传播启蒙思想的前沿阵地, 全民参与讨论的“美学热”成了空前的社会奇观。怀着启蒙主义的热切信念, 杨春时先生也选择了攻读文艺学专业。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以《论艺术的审美本质》为题, 论证了审美超越现实的观点, 这在反映论盛行的80年代初不仅极为超前, 而且不啻是异端邪说。毕业后, 他又坚持自己审美超越论的思想, 创作了《审美意识系统》、《系统美学》、《艺术符号与解释》等专著。在这一时期, 杨先生虽然加入了启蒙主义的主体



性美学的阵营，却把自己的理论建构在生存论的基础上。他的生存概念，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的。生存论哲学为他最终超越启蒙主义美学埋下了思想线索，又勾勒了自己恢弘精深的美学体系的最初蓝图。1985年，文艺理论界围绕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了新的论争，杨春时先生是配合刘再复先生的发起者、参与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4年，杨先生初次会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先生，相谈甚欢。杨先生建议刘先生阅读李泽厚先生刚刚发表的《康德哲学与主体性论纲》，并且针对传统的反映论的文学本质观，撰写一篇“论文学主体性”的论文。刘先生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在阅读了李泽厚先生的文章后，与杨先生商讨了文章的基本观点和写作的思路。刘再复先生的文章《论文学的主体性》发表后，震动全国，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论争，这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最重要的论争。论争一开始，杨春时先生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文艺的充分主体性和超越性》，不仅肯定了文学的主体性，而且还提出了文学的超越性思想，从而成为独树一帜的代表人物。

20世纪90年代，新启蒙运动戛然而止，后新时期的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生存状况的改变，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启蒙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化。杨春时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历史转变，首先发难，向主流学派实践美学挑战，而他建构的审美超越性理论为批判实践美学提供了思想武器。在1993年的全国美学大会上，他作了“超越实践美学，走向现代美学”的大会发言，立刻成为会议的焦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就此拉开了序幕。会后，他与众多知名学者展开论战，发表了批判实践美学的一系列文章，其中《走向后实践美学》一文，还使后实践美学学派得到了命名。他在肯定实践美学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它作为启蒙主义美学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这场轰轰烈烈的美学论争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甚至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停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论争打破了实践美学的一统天下，促进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带来了美学的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不仅观点各异的后实践美学学派在论争中产生，既有的实践美学理论也经过反思和改造，得以发展、更新，同时也分化出“新实践美学”理论。杨春时先生的“主体间性超越美学”，也在论争中得到了深化完善，终于成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美学理论。

2013年末，杨春时先生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美学原理专著：《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存在、现象与审美》。这本书体大思精，极具创造性，完整地建立起“主体间性超越美学”理论体系。首先，他为审美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他创造性地把存在规定为：存在是生存的根据，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存在具有本真性和同一性。他进一步论证了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方式，是对存在的回归。由存在的同一性和本真性推导出审美的超越性和主体间性。审美超越性问题自他在硕士毕业论文中提出以来，不断发展，最终找到了本体论基础，即存在的本真性。他克服了生存论的主体性偏向，提出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概念。这一概念作为存在的同一性的展开即我与世界的共在的具体实现，既超越了胡塞尔的认识论意义的主体间性，也超越了哈贝马斯社会学意义的主体间性，是对哲学本体论的根本改造。



同时,杨春时先生也建立了审美现象学。在现代哲学中,现象学与存在论是两大系统,但二者的沟通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经过对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反思和批判,他提出了革命性的审美现象学理论:现象学具有本体论的根基,即现象是我与世界的共在,是存在意义的显现。审美体验具有主体间性的意向性性质。审美是由经验意识向自由意识的超越。审美意象不是表象,而是真正意义的现象,是存在的显现。审美是对存在意义的领会,美学是充实的现象学。他指出,审美是对存在的体验和发现,而哲学是对审美体验的反思和对存在意义的论证。于是,杨春时先生极具颠覆意义的观点便在严密的论证中破空而出——“美学不是艺术哲学,而是自由之学、超越之学;美学不是哲学的分支,美学是第一哲学。”杨春时先生的体系不仅沟通了现象学与存在论,还在新的存在论基础上构建了现代形而上学,为克服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倾向提供了根据。

杨春时先生虽然主攻美学,但对文艺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化思想史等领域也有深入研究,出版了多种相关著作,而且多有独到的建树,其中《美学》、《文学理论新编》被列入国家规划教材。现代性理论是当代人文科学的前沿理论,运用这个理论来研究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还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新领域。1996年底,杨春时先生发表了《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一系列文章,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论争。从那时起,文学现代性成为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前沿论题,使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杨春时先生出版了《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映的观点,从而克服了苏联理论以“创作方法”对文学思潮的定性;还提出了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的理论,从而揭示了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动因。他深刻地把握了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与文学思潮间的关系,从而对各种文学思潮进行了科学的定位,得出了许多具有颠覆意义的结论:五四文学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古典主义;五四以后革命古典主义取代启蒙主义根源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压倒了争取现代性的历史任务;而新时期启蒙主义取代革命古典主义根源于现代性建设成为主要的历史任务;五四以后以及新时期后期和后新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则根源于现代性的初步确立以及反思现代性的历史需要,等等。这种历史叙述打破了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的桎梏,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到了理论根据,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了全新的建构,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对杨先生的学术道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学术战线上的时代弄潮儿的形象,看出他永不停步、不断超越的思想品质。上个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实践美学是上世纪80年代美学界最为新锐的理论,它高扬主体性,相对于反映论美学,已然具有鲜明的进步性。杨先生在吸取这一思想的同时,更进一步地探索审美对实践、对现实生存的超越性。在毕业论文中,杨先生不仅甩开反映论的羁绊,还对实践美学的理论展开新的突破,旗帜鲜



明地强调：审美超越现实，是自由的活动；审美意识超越现实意识，是自由的意识。这就突破了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当系统论为代表的新方法论热盛行于学术界时，杨先生也开展了自己与之相关的思考，利用系统论方法建构了“人类总体意识结构”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意识的三种层次：无意识、非自觉意识和自觉意识；意识的三种水平：感性意识、知性意识和超越性意识；意识的两个方面：认知方面和意向方面，从而对意识结构做了系统的建构。其中对审美意识做了定位：超越性非自觉意识。这一理论不仅解决了审美意识的性质问题，而且具有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开拓性意义。依据这一理论，他后来又构造了符号学体系。至于他“主体间性超越美学”体系的创建，就更是集美学思想之大成的、戛戛独造的全新超越了。他对存在论的建构，他提出的本体论的主体间性理论，关于存在论与现象学同一的理论，关于审美是第一哲学的理论，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美学包括实践美学，而且做出了更普遍、更深刻的哲学建树，其学术价值在学术史上将日益被证明。

钱锺书先生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杨先生之为学也正如是。他的美学体系来源有二：既汲取西方美学的思想资源，又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爬罗剔抉、发掘宝藏。他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主体间性，以区别于西方的主体性美学。他揭示了中国美学的空间性，以区别于西方美学的时间性。他揭示了中国美学的现象学特性，以区别于西方美学的认识论传统。他揭示了中国同情论美学，以区别于西方的理解论美学。这些发现为中西美学的对话找到了切入点，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找到了方向，从而展开了对中西美学思想的超越。

回首30余年的学术历程，杨春时先生说道：“我的学术思想既一以贯之，又有发展变化。说一以贯之，是指坚持了审美的超越性。说有发展变化，是指从实践美学走向生存论美学再走向存在论美学；从主体性美学走向主体间性美学；从认识论美学走向现象学美学；最后从西方美学传统转向中华美学传统，开展中西美学的对话，在中西美学的互补、融合基础上，建立了主体间性超越美学。”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这位纯粹的学者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超越，永不止步的超越。

### 担当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面对社会现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杨先生虽然拒绝行政职务，但并不回避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学术上做出创造，还要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因此，必须坚守独立性，承担起反思者、批判者的责任。他深刻地反思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更深切批判当代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面对新时期中国启蒙事业遭遇的挫折和困境，曾经的旗手李泽厚先生不无悲观地引用定庵先生的词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相较之下，杨春时先生始终坚持启蒙信念，呼吁“启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指出，中国现代性具有未完成性，知识分子作为启蒙的主体，应当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以学术话语坚决地批判封建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



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反启蒙思想，也坚决批判种种消解启蒙思想的后现代思潮。

杨春时先生既做思想上的启蒙者，更在生活中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人格操守。20世纪80年代，是启蒙与蒙昧、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势力搏斗的时代，这种历史形势考验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杨春时先生旗帜鲜明地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从不退缩，写作了许多鼓吹启蒙思想的文章。在左的思潮袭来时候，他敢于坚守信念，决不屈从；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勇于承担责任，保护同一战壕的同志，令人肃然起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敢于坚持正义。当年他调到某单位工作时，发现个别中层干部多年来大肆侵害教职工利益，由于种种顾忌，群众对此敢怒不敢言。嫉恶如仇的杨先生岂能坐视？他一面展开调查，掌握了切实证据，一面征集群众意见，向组织反映，要求处理。孰料该人不仅倚仗其关系和势力拒绝认错退赃，还对杨先生进行威胁恐吓，甚至扬言要买杨先生的人头。但杨先生不为所动，坚决抗争，迫使该人最终撤职调离。

在杨春时先生担任第9、10、11届全国政协委员的15年里，他的社会责任感得到更全面的体现。他认为，虽然政协委员并无实权，提案也没有法律效力，但应该利用这个平台为人民说话，形成社会舆论，推动社会进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说白不说”。如果我们阅读杨先生的提案，就能更直接地感知到一位学者深厚的现实关怀：他反对学术腐败，提出“清理官员读博”的议案、反对“官员当博导”的议案。他呼唤学术自由，为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鼓与呼，提出“关于向全国公开招聘大学校长的建议”、“关于改革大学的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建议”、“关于学者治学的建议”等等议案。他关注社会民生、关心贫困群体的疾苦，提出“城乡教育均衡化”、“给农村孩子增加营养午餐”、“救助流浪乞讨儿童”等提案。在2001年，他第一个提出“在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案，并且连续不断地呼吁，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直到2007年中央施行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他关注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出“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在同级人大的领导监督之下实现司法独立”、“取消劳教”等议案。他曾经为了城市环保，顶住压力，参与发起了撤销某个化工项目的提案，引起社会的重大反响，最终使这个项目被撤销。在一次全国政协会上，针对某项欠妥当的、产生了负面社会效果的社保改革方案，杨先生联合近百名委员提出议案，建议中止该方案的实施，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反响。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受教育界委员的公推在联组会上发言，雄辩地论述了该方案的错误，指出该方案不仅损害群众利益，还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他的发言得到了会场持续不息的掌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当场表态，最后中止了该不成熟的方案。“登高一呼，山鸣谷应”，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15年里，他的提案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了广泛的回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也切实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杨先生在自己的一部著作的后记中引用孔子的话。在30余年的治学道路上，杨春时先生不断超越，以他的为学与为人，实现了自己最初的志向——“做纯粹的学者”。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陈建宁）